

# 新时代外语界面研究: 理论、方法与实践

## ——第五届外语界面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评

谭小勇<sup>1 2</sup>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2.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331)

### 0 引言

2021 年 10 月 29—31 日,“第五届外语界面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 2021 年会”在重庆市师范大学举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云集山城与云端,探索外语界面研究,线上参与状况累计超过 5 万人次,盛况空前。本次会议聚焦“新时代外语界面研究新发展: 理论、方法与实践”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外语界面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外语界面研究的前沿理论”、“外语界面研究的方法论”、“外语界面的互动与融合研究”、“新文科背景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新文科背景下的翻译、文学与文化研究”、“数字媒体、技术创新与外语界面研究”、“语言、文学、翻译与视觉艺术研究”、“文学文体学与认知诗学研究”和“对外话语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研究”等热点话题。

### 1 界面研究理论思考

自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于 2012 年成立以来,学界一直从不同角度关注并进行对外语界面研究的理论思考。潘文国(2012: 1)对界面研究的性质、任务、范围和学术定位等进行了讨论。董洪川(2012: 3)认为外语学科的界面研究包括外语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和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跨界研究”两个重要的向度,并且界面研究是“一种学术立场,一种学术态度,一种自觉的学术研究意识”(刘丽芬,2019: 86)。2019 年,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了由国内名家导读的“新世纪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集中推介了国外近年出版的界面研究的一批典范之作,引起国内学者对外语界面研究的极大关注,推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学界也逐渐形成共识,认为界面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具有本体论性质和认识论意义(熊木清等 2019: VI)。

研讨会上,四川外国语大学李洪儒教授在《界面理念指导下的中国语言哲学论纲》中指出,界面研究的本质属性和核心要义之一就是要突破学科之间和领域之间的方法论壁垒,研究现有学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整合途径以实施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性研究,实现从“专”到“全”的回归。他讨论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和研究目的的关联性,揭示基于二者的学科间性开展界面研究的可行性和学理基础,并构拟了基于界面研究的新时代中国语言哲学的建设纲要。他指出,要通过重读经典和多元吸收开展多学科及学科界面的理论建构,充分认识语言的相对性、人的有限性以及通过语言来研究人及人的世界的学科

收稿日期: 2021-11-05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斯里兰卡关系研究”(2019WYZZ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具身认知中的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与认同”(19XYY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谭小勇,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 156 •

目的,明确以汉语和尚待充分研究的世界诸语言为研究对象,通过界面理念指导来把握语言整体研究,以构建基于汉语的语言哲学王国。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陈勇教授在《从符号学看界面研究》中强调界面研究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性质,认为无论是从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论还是从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论来看,语言符号性本身就折射出语言的界面性质。不同符号域的同构性问题是符号学研究的核心。他总结了符号学研究界面研究具有的四个方面共性特征:研究本体均具有界面特征、均彰显基于比较或对比的鲜明的方法论价值、均高度关注系统间或要素间的同构性关系,以及符号学强调“符号(媒介关联物)——世界(对象关联物)——人(解释关联物)”这一大三角关系框定了外语研究所涉及界面所属的范畴位置。陈勇教授以俄罗斯符号学代表人物洛特曼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为例说明符号学研究的界面性质,认为开展外语界面研究是新文科建设的需要,响应了新文科建设培养文理相通、人文社科相通、中西相通、古今相通和知行相通的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最后,陈勇教授对语言学、翻译学和外国文学等如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进行界面研究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阐释。

华中师范大学王文惠教授在《文本社会学新论:一种文学界面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指出,近年来文学研究与社会学批评的交叉延伸出文学社会学、文本社会学、文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等理论。文学与社会学的界面视角着重阐释文本社会学视界融合的特质并梳理如何借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做文学批评研究。文本社会学以作品的语言结构为重心,将“社会批评”与“文本分析”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同时利用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等理论资源,形成结合批判与实证、外部与内部为一体的跨学科辩证思维模式和界面融合的批评理论和范式。(王文惠 2021: 48)

## 2 翻译与国际传播界面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在此重要背景下,翻译实践、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界面研究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共有七名大会发言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此话题进行主旨发言。

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会长、广西大学罗选民教授在《大翻译与汉语世界文学经典的构成》中提倡一种全球化、超文本和跨学科的大翻译理论,强调注重历时的典籍文献翻译,呼吁从地缘性角度挖掘翻译资源,通过共时和历时的翻译来研究形成国家翻译的大格局,产生翻译研究的大数据,最终在文学、翻译和传播的跨界互动中形成世界性的集体文化记忆和世界文学经典。他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和世界文学形成的有关论述,运用互文性的分析说明大翻译是催生和加强集体文化记忆的必要手段。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大翻译形成异文化传播“产业链”,将中国文学的个体文化记忆上升为集体文化记忆,通过文化传播形成汉语世界文学经典。

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和平教授的《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加强新时代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建设对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意义,他将翻译实践与研究、国际传播和翻译人才培养放在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门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从传播学的视角将翻译定义为“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的有意图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传播行为、过程和事件”,揭示二者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强调新时代翻译教育要通过跨学科研究培养合格的国际传播人才,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话语权提升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王建华教授在《多模态网媒文化外译传播体系建构》中认为,重视和提升主流网媒非文本

信息的翻译转换和传递效果是加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其报告阐释了多模态与多模态文化的学理依据,指出在文化外译传播时需注意副文本的叙事、符号间关系以及认知与修辞等问题,提倡在多模态认知机制基础上构建图像/文字整体概念化和视觉/听觉信息通道概念化相结合的网络媒介外译传播认知策略。在分析当前文化外译传播重点领域的多模态传播案例后,他提出建构多模态网络文化外译传播体系模型的原则和构想。

同济大学吴贇教授的《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研究的现实思考与理论探索》从研究对象、横向共时维度、研究视角和研究应用性等层面讨论了现有研究的得失,并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构建国际传播多声部、立体化战略体系;将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有机结合,借鉴国别区域研究范式,形成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综合研究模式;围绕应用性研究的问题导向性,建立动态更新的国家对外话语实践数据库,跳出“以我为主”的固有立场,探究国家对外话语实践的实证研究方法;以“阐释性翻译”和“多模态传播”为支点,提出国家对外话语理论模型,推动国家对外话语理论革新;推动多学科融合拓展学术研究,在外国语言文学、传播学和政治学等三大相关学科基础上建立“国际传播”交叉专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丽芬教授的《中国话语非英语翻译本土化研究——以“共享X”俄译为例》关注中国特色话语和文化的对外传播有效性,以“共享”类新表述为研究个案,通过俄汉“共享”一词的义素分析,以俄媒和俄语国家语料库相关表述为例证,提炼出五种不同的俄译。她指出,所有俄译均缺失汉语“共享”一词所固有的“获得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附加义。该研究结合语料库技术手段,勾勒出中国话语非英语翻译本土化的操作路径,为我国文化传播、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外译提供了界面研究新思路。

华中师范大学苏艳教授的《佛经著译与“警察”概念史研究》梳理了“警察”一词内涵演变的三个阶段,即佛经翻译过程中被概念化并被赋予“觉”的内涵、儒佛融合过程中其内涵具体化为治安职能,以及佛教治世观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心性实体化,成为国家治安机构及其人员的统称。该研究结合宗教史、翻译史和概念史的交叉研究方法,是外语界面研究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典籍翻译和词源学的典型研究个案。

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子满教授的《〈毛泽东选集〉译文注释的后翻译研究》认为根兹勒提出的“后翻译研究”理论(Gentzler 2017)关注文化的翻译性,研究翻译的跨界改写和改编,将研究视角从文本内移向文本外,探讨译作对接受文化的全方位影响,本质上是提倡超学科的翻译研究。《毛泽东选集》这种原文既包涵翻译、翻译后又影响目标文化的现象,与“后翻译研究”完全吻合。报告以翔实的译文与注释为例证说明《毛选》英译文对原文中译文的翻译,是一种典型的“翻译的翻译”,是“后翻译研究”过程的完整体现,反映了我国政治话语国际传播的特点,体现了我国政治话语融通中外的本质属性,也对如何有效结合“后翻译”研究与国际传播具有启发意义。

### 3 语言学研究中的界面探索

复旦大学高永伟教授在《中国英语词汇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将中国英语(Chinese English)词汇体系的建设放在汉语词汇向现代英语的持续输出这个动态和历时过程中进行研究,结合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念断和霍凯特关于“文化负载词”造成的文化空缺现象的研究,阐释了中国英语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并建议从词典学角度出发,以英汉外来词词典编纂为基础,通过语言规划和推广,以仿造词、音译词和复合词等构词方式增加英语中汉源词汇的数量,逐渐形成中国英语自身的词汇体系,并对英语现有汉源词汇中具有文化误解和意识形态偏差的词汇进行修正。

重庆师范大学石勇副教授的《中医隐喻思维及其特征》结合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分析传统中医理论进行自身阐释的方式,认为中医隐喻思维是通过整合中国哲学和医学传统概念,以“天人相应”为出发点,以“取象比类”为方法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用以解释人类疾病健康和寻求辨证论治的复杂认知过程。该

报告指出,传统中医理论在借助概念隐喻理论进行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呈现出简单/归类双重映射结构、实体/过程双重本位思维和阐述/推测双重运用功能三种特有的认知特征。

重庆大学曹洪文副教授的《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分享了整合语言学、脑学科、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语言学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报告以第一语言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第一和第二语言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以及提取练习促进第三语言学习和记忆保持等三个实验为例,说明学科交叉如何拓展研究界面和带来新的学术增长点,体现新文科背景下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创新与学科交叉融合的必然趋势。

重庆师范大学龙明慧副教授在《数字化时代中国典籍多模态翻译研究》中指出,数字新媒体时代的多模态文本给中国典籍翻译带来了新的契机,译者可以充分发挥非语言模态的辅助手段和意义构建功能,构建语言、图像、动画、音视频融合的多模态译本。报告从翻译、传播学和信息技术的跨学科视角探讨多模态手段用于典籍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围绕图文配置、语言与非语言模态的互补平衡以及多模态与文化差异等问题探索典籍多模态的翻译策略,拓展了典籍翻译研究范围。

#### 4 文学、文化研究中的界面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德林研究员在《协商中的“远读”》中指出,弗兰克·莫莱蒂提出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概念借助进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来建构一种世界文学体系和重新规划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对世界文学体系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受到了对其实用性、二手阅读、小说中心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等多方面的质疑。徐德林研究员认为,莫莱蒂以协商的态度和立场面对质疑,不断调和进化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兼容性,进行理论补充以修正和消除学界对其远读理论的误读。同时,远读本质上作为一种研究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方法,完成了从概念模型到计算批评的转向,在计算技术和世界文学研究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促进了学科融合和数字文学背景下的计量文学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陶家俊教授的《批评理论视域中I. A. 瑞查兹的儒学重构》指出,瑞查兹通过加入“合理和恰当、理智和健康”的现代批评精神内核,将儒家“中庸”和“诚”确立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伦理理性精神航标,以此完成对“诚”的现代诗学转换;通过对孟子“心”观念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本主义阐释,对《孟子》进行话语分析来提炼儒家思维特征,以此完成“心”观念的重构及理论关怀。这两个层面动态地表现了瑞查兹的批评理论从向中国他者开放的诗学价值批判向中西方文明伦理根源比较审视的转变。此外,瑞查兹积极探索儒学的现代诗学价值及其现代转换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具有批评理论实践意义和世界文学知识论创新价值,形成了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转型语境中的现代新儒学同步、共时、平行发展的西化现代儒学思潮,将价值批判、道德守护及人本理想深植于剑桥批评理论传统的血脉之中,开启了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崭新的批评理论路径,也充分实证了跨文化理论迁徙过程中现代文明的道路和救赎这一现代思想理论共同的问题面向。

四川外国语大学冯亚琳教授的《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文化空间与文化记忆的展演》指出,小说主要关注工业时代来临时人类新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状态。她借助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探讨以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为核心的空间关联和以文化记忆为特征的时间关联。她认为,空间关联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形叙述,成就了以“漫游”为串接的“平行叙述”方式,并通过对不同移民项目的描写建构起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文化记忆的展演同时又将过去与当下联系了起来。小说展演的这些文化话语虽不乏19世纪初德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但更具有歌德式的整体性世界观指导下的超前性:在以“漫游”和“迁徙”为主导的文化思考中,歌德追求的是多样性而非唯一性;他在指出新时代带来的危机的同时,展演了不同的可能性解决方案。

湘潭大学胡强教授的《“特殊的经验”和“传统”——从〈文化社会〉到〈面纱〉中的情感失序》对毛姆小

说《面纱》的开篇细节展开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多重解读,分析历史和社会变革带给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伦理变化和失序,以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的观点强调工业革命为西方带来的特殊经验和独特传统,以及相伴而生的全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他认为,小说中“面纱”这一核心意象隐喻了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也折射出威廉斯所言的某种隐性的社会秩序危机。小说中及时行乐的伦理观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折射出帝国价值观的腐化与堕落,人物的情感失范体现了殖民地文化的精神危机,表征了社会情感的变迁困境。小说体现了作家在面对社会变革和文化观念变迁时在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反应,以及对现代语境下人与社会、情感与人性、历史进程与文化危机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江西师范大学唐伟胜教授的《“本体书写”与“以物观物”的互释》认为,近20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思辨实在论”和“面向物的哲学”大大丰富了之前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成为“物转向”的新动力,然而国内对于“物”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范式,相对忽略了“本体书写”层面。唐伟胜教授阐释了“物本体”的四种书写策略,即数学公式、罗列、暗指和主体性,认为它们可产生多种写作效果,服务于不同修辞意图。他指出,在先后经历了老庄哲学、北宋邵雍、近代王国维和当代批评家群体阐释和发展后,“以物观物”可被视为本体书写的中国方案。西方“物”叙事传统更强调物我两分,中国“物”叙事传统则更强调物我合一。西方的“本体书写”和中国的“以物观物”之间各有异同,可以互相阐发。该报告以西方“去人类中心主义”(de-anthropocentric)的“物论”为鉴,鉴别、反观、拓展和升华中国传统物叙事思想,使其在新时代发出新的光芒。

此外,广西民族大学张旭教授的《立足三性、聚焦东盟、面向未来: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若干思考》结合该校“民族性、区域性、国际性”办学特色,介绍了该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近年来立足广西,面向东盟,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建设和国家战略,聚焦区域与国别研究,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提升学科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中国—东盟国家战略智库研究、专业委员会建设以及中国翻译和翻译家文献整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科研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学科方向特色。张旭教授的报告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如何结合国家战略、地缘优势和学科特色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研讨会的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从外语界面研究的宏观理论思考、中观方法创新和微观研究案例等多方面开展研讨,精彩纷呈,体现了新时代和新文科背景下外语界面研究的新动向和新发展,凸显了“搭建一个新的学科研究沟通平台,加强外语界面研究的成果交流,寻找外语学科研究的学术增长点”的立会宗旨(董洪川等,2021: viii)。下一届外语界面研究学术研讨会将于2022年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

#### 参考文献:

- Gentzler, Edwin. 2017.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in the Age of Post-translation Studies* [M].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董洪川. 2012. 界面研究: 外语学科研究的新增长点[J]. 外国语文(5): 2-3.
- 董洪川, 刘丽芬, 胡安江. 2021. 外语界面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刘丽芬. 2019. 界面研究: 内涵、范式与意义[J]. 外国语文(5): 84-90.
- 潘文国. 2012. 界面研究四论[J]. 中国外语(3): 1+110-111.
- 王文惠. 2021. 文本社会学新论: 一种文学界面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 外国语文研究(1): 43-48.
- 熊木清, 董洪川. 2019. 总序. 新世纪英语语言文学界面研究丛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肖谊